

吳戈

商總從「護僑堡壘」到「公益先鋒」的嬗變



吳戈談僑

1954年，菲華商聯總會菲律賓排華暗流湧動的年代應運而生。彼時，菲律賓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政府屢有排華政策出台，華僑華人惶恐不安。商總初創時的核心使命十分明確——「護僑」：為風雨飄搖中的華族群爭取合法權益、化解生存危機，充當華社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然而，這一地緣性社團並未將自己局限於族群利益的守護者，而是在七十年歷程中完成了向「多功能社會團體」的深刻轉型，其關鍵在於超越族群邊界的公益實踐，將服務對象從華社擴展至整個菲律賓社會。

這一轉型最具象徵意義的案例，當屬1961年啟動的「農村校舍捐獻計劃」。彼時，菲律賓鄉村公立學校教室嚴重匱缺，莘莘學子常在風吹日曬的室外上課。商總理事長蔡孝因及全體同仁率先垂范，發起號召鼓勵全菲華商捐建兩間一室的簡易校舍，並使之成為商總持續六十餘年不間斷的旗艦公益項目。截至近年，全菲各地已累計捐建超過六千座農村校舍、逾一萬兩千間教室。

這項計劃巧妙地將解決菲律賓國家教育痛點與重塑華人形象相結合：校舍多以捐獻者或其先輩命名，但服務對象是廣大的菲律賓鄉村學童，不分種族與信仰。菲律賓前總統科拉松·亞諾諾及亞羅育均曾撥出巨款委託商總代建校舍，參議長坎倫倫更從特別基金中撥出五千萬元交由商總興建，勞工部、外交部及教育部亦紛紛與商總簽訂委託協議——這標誌著該計劃已從華社的「獨角戲」演變為國家認可的公私合作典範。一座座散落在鄉間的校舍，成為菲中民間友誼的無聲紀念碑，極大地消解了主流社會對華人的隔閡感。

除教育外，商總的公益體系覆蓋醫療、救災、治安等公共領域，形成了被譽為「菲華三寶」的公益品牌。醫療方面，

商總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便鼓勵華社設立義診隊，為低收入民眾施診贈藥。每週定點的義診活動從八十年代簡陋的改裝流動診所起步，如今已發展為配備X光、超聲波和心電圖的現代化流動醫療巴士，每次服務患者數百至上千人。救災方面，每逢天災，商總及其一百六十多個附屬會員單位總是走在賑濟隊伍前列，2012年更聯合華社七大團體共同組成「華社救災基金」，彙集逾億比索捐款，使救災行動機制化、常態化。治安方面，商總自六十年代起倡導成立志願消防隊和防火會，數千名志願消防隊員在全菲各地奮勇救火，贏得主流社會高度讚譽。2003年SARS危機中，商總主動配合衛生部印製防疫海報、分發口罩、組織消毒，為菲律賓成功免遭侵襲做出重要貢獻。

這些公益行動的共同特徵在於精準對接菲律賓國家發展的結構性需求，而非僅服務於華人社區。正如蔡清潔先生擔任理事長時所強調的，華社應當「主動融入菲律賓主流社會，與主流社會分享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和美德，共同發展，共同繁榮」。1979年，馬科總統特別頒發總統法令，規定每年3月23日至29日為「菲華商總周」——這一罕見的官方嘉獎，標誌著商總的公益貢獻已獲得國家最高層面的認可。

從高祖儒先生在馬科斯時期充當「華社與總統府溝通的橋樑」，到陳永裁先生任內傾力振興華文教育、設立文教委員會，再到莊前進先生促成華社救災基金的創立，乃至現任理事長施東方博士提出「華人的血統，菲人的心懷」理念並增設政務及立法聯絡委員會，一代代商總人薪火相傳，逐步將公益功能制度化、常態化。商總由此完成了從「為僑請命」到「為國民服務」的角色躍遷，使華人形象從封閉的「經濟動物」轉變為開放的社會責任共擔者，為華人在菲律賓的長期社會融入奠定了堅實的民意根基。

穆西

《給阿嬤的情書》照見東南亞華人的身份認同



各說各話

一部電影，為何會掀起一場關於國家認同、族群認同與地緣政治的激烈辯論？

近期席捲中國票房的潮州話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原本只是一部講述泰國華人家族故事的溫情作品。影片透過三代人的命運，描繪華人移民在異鄉扎根、傳承文化與維繫親情的歷程，以潮州話、家族記憶和鄉愁為主軸，成功打動無數觀眾。然而，當這部電影被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統戰部）公開點名肯定，稱讚其展現海外華人「血脈相通、情感相通」的價值後，它的意義便不再局限於電影本身，而迅速演變成一場關於中國文化影響力的國際討論。

支持者認為，《給阿嬤的情書》不過是中國電影工業日益成熟的成果，也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次成功實踐。

電影講述海外華人的故事，本來就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能夠喚起散居世界各地華人的共同記憶與文化情感，無可厚非。

然而，在不少東南亞國家，尤其是新加坡，另一種聲音卻逐漸浮現。當一部描述海外華人生活的電影，被納入官方「講好中國故事」與統戰工作的敘事框架時，便難免令人質疑：文化交流是否正在被賦予政治使命？原本屬於文化與歷史記憶的作品，是否因此被賦予了新的政治意涵？

新加坡《聯合早報》便公開提出批評，認為電影引發的爭議，不在於藝術本身，而在於官方賦予它的政治定位。這場討論很快超越電影內容，延伸至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隨著中國國力快速崛起，北京是否正試圖透過文化作品重新塑造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

巧合的是，就在這場討論持續發酵之際，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訪問中國期間，再次重申了新加坡長期堅持的立場。他明確表示，新加坡雖然是一個華人占多數的國家，但同時也是一個多元種族社會，是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

新加坡與中國發展友好關係，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而不是共同血統或族裔。

李顯龍這番話之所以引起國際媒體高度關注，正因為它點出了東南亞華人社會

數十年來一直努力區分的兩個概念——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

東南亞華人大多保留著中華文化的傳統。他們祭祖、過春節、說華語，也可能說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甚至仍然珍藏祖輩從中國帶來的族譜與家書。然而，這種文化傳承，並不意味著政治認同的延伸。今天的泰國華人首先是泰國人，馬來西亞華人首先是馬來西亞人，新加坡華人首先是新加坡人，而非菲律賓華人首先是菲律賓人。他們的祖先或許來自福建、廣東或海南，但經過數代人的融合與發展，他們的國家歸屬早已建立在出生、生活與共同命運之上，而非祖籍所在地。

對菲律賓華人而言，這種感受或許更加深刻。菲華社會百餘年來始終在保存中華文化與融入菲律賓社會之間尋求平衡。一方面，華校、宗親會、商會與各種文化團體努力保存語言與傳統；另一方面，菲律賓社會也始終強調忠於菲律賓、服務菲律賓，積極參與國家建設。

尤其近年菲中因南海問題關係緊張，更令不少菲華人士反覆強調：熱愛中華文化，並不同支持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立場；保存祖先文化，也不代表改變自己的國家認同。

事實上，海外華人的身份本來就具有多重層次。一個人可以認同中華文化，也可以完全忠誠於自己的國家；可以懷念祖先來自潮州、泉州或廣州，也可以毫不猶豫地認同自己是菲律賓人、新加坡人或泰國人。文化可以跨越國界，國籍卻屬於現實；歷史可以共同分享，主權卻不能混為一談。

《給阿嬤的情書》之所以成為一部現象級電影，正是因為它喚起了海外華人共同的歷史記憶。

然而，它所引發的爭議也提醒我們，在當今國際政治環境下，任何涉及海外華人的文化敘事，都難以完全脫離地緣政治的解讀。

或許，真正值得珍惜的，不是將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畫上等號，而是尊重海外華人社會歷經百年所形成的多元身份。當文化成為彼此理解的橋樑，而不是政治立場的標籤，《給阿嬤的情書》所承載的情感，才能真正跨越國界，也跨越不同制度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鴻溝。

陳衍德

赴菲訪學的意外收穫

——重溫我的《旅菲日記》（六）



各說各話

被稱為「象牙塔」的大學，除了從事教學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學術研究，而學術研究是沒有國界的，所以大學的國際交往似乎是天經地義的。然而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大學的對外交往是少之又少的。當改革的春風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出國留學的大潮便隨之而來。緊隨其後的是大學教師的出國交流學習，我有幸躋身其間，於1992年3月從廈門大學來到馬尼拉雅典大學，開始了為期一年的訪學交流。

那次訪學使我大開眼界，吸收了許多在國內難於得到的知識與經驗，並促使我開始進入華僑歷史研究的領域。除了赴菲之前制訂的研究計劃逐步得到實施之外，我還意外地得到了許多其它收穫。這些收穫並非都在訪學的一年中實現，有的是在離開菲島後才開花結果，但究其緣由，卻源於在菲的學習與工作之中。翻開我的《旅菲日記》，一樁樁一件件便浮現於我的腦際……

第一個意外的收穫是在離菲返國途中於香港停留期間最終實現的。我在1992年7月3日的日記中有一句流水賬式的話：「下午在家，給香港大學歷史系的顏清滄先生寫了一封信，然後看書。」此前我獲悉顏先生正受聘於香港大學為歷史系主任，他因華僑史研究而聞名於國際學術界，我遂萌生了返國途中拜訪求教於他的念頭（我原本就計劃在香港停留）。雖然我與他素昧平生，也無人牽線搭橋，但我還是冒昧給他寫了信。在信中我表達了對他的仰慕，還介紹了我在菲島華人社區調查研究的成果。當然我對收到回信並不抱太大希望，然而驚喜還是發生了：「今天在（雅典大學）中國研究室還收到顏清滄先生寄自澳大利亞的信，告知他已離開香港大學，我給他的信是港大轉去的。此信寫於7月22日，可能是托人帶來的，因信封上沒有郵票和郵戳。」（1993年9月23日日記）也就是說，我去信80天後即看到了他的回信，而這一去一來都是跨越大洋的。

這位虛懷若谷的學者在信中寫道：「你明年3月返廈門路過香港，如有時間當然可以到香港大學歷史系一訪。現系主任呂元聰教授是我的舊同事，我相信他會歡迎你的到訪。」信中他還介紹我去香港中文大學找他的老友鄭赤琰教授。1993年1月22日我在日記中又簡略地寫道：「上午……給香港大學的呂元聰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鄭赤琰各寫了一封信。」月餘之後，2月25日我「與香港大學歷史系主任呂元聰通了電話，他同意我用中文講《自然環境的變化對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這一講座，時間安排在3月12日下午3點。他要求我用傳真將詳情報告他。」（當天的日記）次日我便將傳真件

發出。僅憑我的自我介紹，顏先生就為我打開了講學之門。而港大並不講究論資排輩那一套，對我這樣的藉藉無名之輩何等包容（當時我只是一名講師），還特別允許我用中文講課（港大的教學言語乃是英文）。只重學問不重地位，這才是真正的知名學府啊！我在港大的講課圓滿結束後，心中的慨歎至今猶存。多年以後見到顏先生本人時，更是感慨莫名……

第二個意外收穫的故事延續的時間更長。在菲訪學期間，我在華裔青年聯合會查閱資料時，發現了一本中英文雙語期刊《亞洲文化》，這是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出版的年刊，上面的文章讀來饒有興味，作者來自世界各地，大大開闊了我的眼界。不久，我便將一篇來菲後寫成的論文投稿給了該刊。在1992年8月29日的日記中我寫道：「上午去郵局，將我的文章《試論菲華社會的宗教融合》寄給新加坡《亞洲文化》主編廖建裕博士，用掛號信寄，花了28比索。」同年12月30日，我又給廖先生寫了一封信，並附上我的另一篇文章《馬尼拉華人的閩南地方神崇拜》，我在日記中也記下此事。回國後不久我即收到他的回信，告知編委會已審閱我的兩篇文章，並決定採用閩南地方神崇拜那一篇。1993年8月《亞洲文化》第17期刊出了我的文章，這是我第一次在海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

1993—1994年間，我與廖先生先後通了6次信。接下來，該刊第18期（1994）、第21期（1997）又發表了我有關菲律賓華人的兩篇論文。我與廖先生成了好朋友，還多次在新加坡見面暢敘。從菲律賓到新加坡，意外的收穫接連不斷。

翻開我的《旅菲日記》，稱得上意外收穫的事其實不少。這裡謹再記一件。「今天上午與王國柱一起乘空調大巴去甲米地……我們沿著主要大街來回逛了一下，還到市場看了一下。在菲華商會和一座教堂外拍了照片……」（1992年12月4日日記）王國柱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博士候選人，赴菲搜集論文資料，與我成了鄰居。他的閱歷比我豐富，研究能力也很強，與他的交往讓我收穫不小。「上午跟王國柱一起去國家圖書館，在他指點下，我借閱了幾本從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新聞日報年刊》，在裡面找到不少寶貴的資料……今天共做了十張卡片，收穫不少。」（1992年12月11日日記）我們經常聊天，我從他那兒瞭解了許多學術方面的信息。離開菲律賓後，我還與他保持聯繫。他的博士論文《菲律賓經濟中的華人，1898—1941》（英文版）出版後，我還收到了他寄贈的一本。偶然的相遇，使我倆的人生軌跡出現了交集。如果不是緣分，如何解釋這樣的意外帶來的收穫呢？

渺渺往事，拳拳心問。菲島賜福，我當自勉。

潘美春

慢慢成長



特稿

一眨眼的功夫，兒子從那個伶牙俐齒的小男生到現在快一米七的帥高個兒的小伙子，已經是十二歲的人兒了。前天晚上爸爸出去應酬，兒子跑來房間問我：「今晚可以跟你一起睡嗎？媽媽！」我說：「可是你爸一個人睡不太好吧？」他有點生氣地回我：「哼！我天天自己一個人睡，也沒見你說過不太好吧！」其實是因為你長大了，我單純覺得你就是應該自己獨睡。最後還是答應了你跟媽媽一起睡。

真挺懷念你小時候，我們一起睡覺的那一個個夜晚。一歲多時，我就有意識地想培養你的閱讀興趣，每天我們捧著一本書，我讀你聽，你翻我們一起看，一個多小時的親子閱讀時光堅持了十幾年。從一起閱讀到各自閱讀，我們擁有的時光是那麼的美好，溫馨！如今你依然熱愛閱讀，享受閱讀，與媽媽在一起閱讀的時光依然有，但是越來越少，越來越遠了，這是媽媽最珍貴最懷念的溫暖回憶。

臨睡前，我們合上書依然要聊一會兒心裡話。你感慨地說：「如果世界上有「時

間儲蓄銀行」該多好呀！」我問：「為什麼？」他說：「感覺到了初中時間一直不夠用，如果有時間儲蓄銀行，就可以把小時候很多荒廢的時間儲存到銀行，現在拿出來就好了。」是呀！我很有觸動地抱著兒子：「你真聰明！其實你現在還有一些時間是可以儲蓄的，因為時間像牙膏一樣，要一點一點地去擠出來用，如果你平時養成好習慣，就不會浪費時間，把很多知識儲蓄在頭腦裡，那等到高中甚至大學時，現成的知識運用上了，其實就已經是在把儲蓄的時間拿出來用了。」兒子恍然大悟似的，開心地說：「媽媽說得也是有道理的！我好好加油！爭取多儲蓄一些時間。」我們聊著聊著就睡著了。

第二天醒來，你已經被鬧鐘叫醒，自己洗漱好，特意過來親了我一下，囑咐我：「週末好好睡覺！好好休息！」真是個會心疼人的娃！媽媽好暖心，之前的種種苦換來如今的日日甜，值了！

謝謝我親愛的寶貝！希望你慢慢長大，不要長得太快，太急。時光呀！你慢些走，讓這份愛變多變厚，在時光機裡慢慢儲蓄，留下將來慢慢回憶，這也算是在「時間儲蓄銀行」裡寄下了。

蘇麗莎

別人失信於我的感覺



寶島來鴻

與教友A相約要去大溪聖方濟堂朝聖，豈料在教堂的臉書上看到A與B一起到聖方濟堂朝聖的照片，我錯愕，不明白為何A一聲不響撇下我，與別的教友前往，當初我肯定的向A說我要與他同行，他也滿口答應，結果竟然放我鴿子。

到失望，我相信A是個守信用的人，但事實並非如此，我曾把別人的承諾當成一回事，結果事實卻與期待的相背。

我有受傷的感覺，也有不被尊重的感覺，心中感到憤怒，我不禁懷疑自己是否太天真？是否看錯人了？

承諾代表關係的重量，當承諾被打破，崩盤的不是事情，而是對這個人的信任、對關係的安全感、對未來的想像。承諾的價值在於能不能被兌現，而不是說的多麼好聽。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